



滇东南区域史 研究论集



何廷明 姜自昌 ©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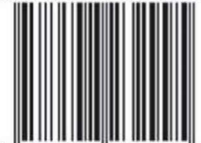
何廷明，男，汉族，1965年10月生，云南马关人，中共党员，硕士，教授，现任云南文山学院成人教育处处长。1983年7月毕业于云南省马关县一中，1987年7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教育专业，同年被分配到文山学院（原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教至今。1989年9月至1990年7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进修。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在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及云南地方史研究。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参与古籍整理出版1部。参与国家级课题1项，主持省级课题1项，参与省级课题3项。



娄自昌，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云南屏边人，云南文山学院人文学院教师，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云南地方民族史、东南亚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3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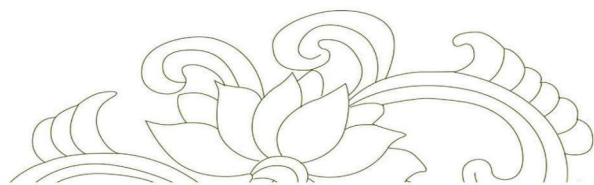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82-32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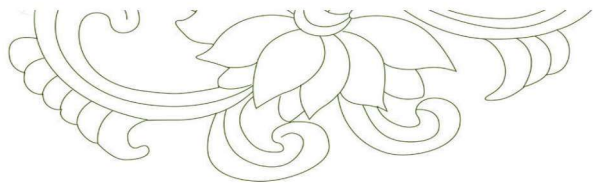


9 787548 232995 >

定价：42.00元



滇东南区域史 研究论集



何廷明 娄自昌 ©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东南区域史研究论集 / 何廷明, 娄自昌编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482-3299-5

I. ①滇… II. ①何… ②娄… III. ①云南—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8245号

组稿人: 孙吟峰
责任编辑: 宋武
封面设计: 周旸

滇东南区域史 研究论集

何廷明 娄自昌 © 编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219千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82-3299-5

定价: 42.00元

地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电话: 0871-65031071 65033244

邮编: 65009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7425573。

文山学院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山学院“中国历史”一流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目 录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的开发述论	何廷明 (1)
清代改土归流对文山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刘从楷 何廷明 (8)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手工业及采矿业发展探究	何廷明 (17)
清代至民国时期文山地区苗族瑶族农业经济探析	何廷明 (27)
《盐课碑》与清代云南省和文山地区的盐政	曾跃明 娄自昌 (32)
论民国时期云南文山地区鸦片的种植与危害	何廷明 (45)
民国时期文山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及变化	何廷明 (54)
云南山区半山区农村经济的半自给自足模式及其走向现代化的困境	
——以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坝子村为例	娄自昌 浦加旗 (63)
滇越铁路通车对文山地区的影响	何廷明 (73)
护国运动在文山	何廷明 (80)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云南边疆官员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辛亥革命	
——以民国《马关县志》撰稿人的倾向为例	娄自昌 (87)
云南文山地区修建飞机场述略	何廷明 (95)
试述抗战期间日机对文山地区的几次轰炸	何廷明 (104)
苗族迁入滇东南和大陆东南亚北部的早期时间考	娄自昌 (110)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苗族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大陆东南亚北部的迁徙	
.....	娄自昌 (119)

18 世纪末 ~20 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大陆东南亚北部迁徙的政治与经济因素	娄自昌 (130)
苗族向滇东南和大陆东南亚北部迁徙的方式与特点	娄自昌 蒙永乐 (139)
边疆边境地区汉族婚俗调查 ——以云南省麻栗坡县董干村委会八里坪村民小组为例	何廷明 (148)
文山州边境地区汉民族风俗与禁忌调查 ——以麻栗坡县董干镇八里坪村为例	何廷明 (155)
云南边疆地区新农村建设及思考 ——以麻栗坡县董干镇八里坪村为例	何廷明 (165)
浅析西华山碑刻所反映的文山地区历史	舒顺尧 娄自昌 (172)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 对文山地区的开发述论

何廷明

摘 要：汉族不是文山地区的土著民族，清初改土归流前有少量移入，但相当一部分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文山地区，与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文山。在与各民族共同交流中，汉族移民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先进文化，促进了文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汉族移民；文山地区；经济文化；贡献

文山，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的东南部地区，东与广西相邻，南与越南接壤。这里居住着汉、壮、苗、彝、瑶、回、傣、布依、蒙古、白、仡佬等 11 个民族，现有人口 340 多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文山地处偏远，加之境内山高箐密、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等原因，成为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晚、发展极为迟缓的地区之一。清初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文山地区，他们与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文山。在与各民族共同交流中，汉族移民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先进文化，促进了文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汉族的迁入

文山地区原无汉族。西汉时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实行“羁縻政策”，汉族始从内地迁入文山地区。北宋皇祐五年（1053 年），狄青征侬智高至特磨道（今广南、富宁一带），派部将沈达领兵驻守富州（今富宁），汉族士兵逐渐在文山地区落籍。南宋时，内地汉商与大理国贸易频繁，大理国至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邕州道商旅穿梭不息，文山地区是必经之地，部分商人留居文山地区经商。由于落籍汉族人数有限，有的被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如沈达后代融

合为壮族。^{[1]335}

汉族大批迁入文山地区，始于明、清时期。民国《马关县志》载：“马关辖境，原属蛮部，本无汉族。自明代沐英镇滇，其部散居各县，汉人足迹，此为嚆矢。”^{[2]193}明初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民屯，以招徕内地汉民族开垦边疆。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后，在文山、广南设置卫所，^{[1]335}江西、浙江、湖南、河南等地士兵举家进入，戍边屯垦，“广南卫开荒垦田 40 578 亩。”^{[3]3}“明代实行军籍制，卫所军士、子孙均入军户”，“军户移民多为汉族”。^[4]明时内地的一些商贩也陆续而至，并落籍下住，成为当地居民。清代实行绿营兵制和汛塘兵制，一是设镇、协、营于各处驻防，有事调遣，事毕返回；二是在一些要地设汛塘关哨隘卡，以千总、把总领兵驻守，分布广泛。改土归流后，广南府、开化府境内按照内地制度设汛，分置塘、卡：广南府境内设板蚌、者宾、富州、剥隘、普梅、阿记得、弥勒湾、命贴、者洪、董高、小维摩、拖白泥十二汛，领七十一塘，三十二卡；开化府境内设新现、坝洒、老寨、麻栗坡、乐龙、石榴红、江那、者腊、六诏、河口、石头寨、捏结白、牛羊、马达、箐口、天生桥、扣览、马街、山车、八寨、交趾城二十一汛，领七十七塘、六十一卡，拨开化镇兵分防驻守。^{[5]1232}这些汛、塘、卡“星罗棋布”，大多分布在交通要道。“绿营兵均为汉人，于远地招募而来，年衰退役后多于驻防之地安家立业”，定居山区，改为民户，因此，有很多居住山区的汉族人民，是被派驻防而落籍下来的；汛塘兵丁亦多从外省招募而来，分防之后，垦田安家，多成居民聚落，他们“定居长住后，往往与原籍互通声息，导引家乡亲朋相率而来”。^[4]汛塘兵制的建立和内地招募的兵丁大量进入文山地区，客观上造成了大规模的移民，有利于文山地区的开发。同时，改土归流的实施，为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曾经是土司控制的文山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农民、工商业者纷纷进入。清康熙以后，川、楚、粤、赣移居之汉族，散居于山岭之间，开山种地，渐成村落。据道光《广南府志》卷二载：“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徙。”^{[6]79}道光《威远厅志》载：“开化所辖安平、文山，广南所辖宝宁等属，因多旷地，川、楚、黔、粤男妇流民迁居垦种，以资生计，其来已久。”^{[7]50}民国《马关县志》记载：“清康熙改土归流时，内省商贩源源而至，客久成家，乐不思蜀，汉族渐盛。”^{[2]193}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说：“麻栗坡汉人占十分之四以上，江浙两湖籍者，喜居平原地带，其职业不一，士农工商均有之。”^{[8]4}有些地区因汉族移民长期聚居，逐渐发展成商业集镇。这些“客籍流民”在文山地区，或凭技艺谋生，或经商贸易，

或入山垦种，或租佃地主的土地，人口逐渐滋长，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责令地方官员稽查造册，以便管理。经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开化所属安平、文山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四千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共二万二千余户。”^{[7]51}“流民”来去无定，且万山之中更难稽查，所报之数难免遗漏。尽管如此，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客户已占过半数”。^{[5]1233}中法战争结束后，裁汰清军达数万人，均流落于文山、广南一带。广南府外地同乡会馆、莲城近郊墓碑和一些《家谱》记载，其汉族自明清主要来自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南京等省市。^{[1]335}至民国时期，文山各县均已居住着汉族人民，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相互交流融合，对文山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

首先，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促使文山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及民族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前，汉民族尚未大规模进入文山地区，此时人口甚少，境内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落籍汉族人数有限，有的甚至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俱系夷户，尚未编丁”^{[5]1232}。就广南而言，“其时分布于四境者，附郭及西乡多农人，南乡多僮，北乡多沙人”。改土归流后，“川、楚、粤、赣之汉人来者渐多，其时滨河之区已无插足余地。商则麇集于市场，农则散于山岭间，垦新地以自殖，伐木开径，渐成村落”^{[9]46}。大批汉族移民从内地举家而来，人数众多，他们以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各地，以民族群体的形式延续下来，并长期保持自己的汉民族特点，在与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和影响。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文山境内形成了“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的分布格局。到民国时期，汉民族已发展成为文山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

其次，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文山地区经济的发展。移居文山地区的汉民族，多来自内地发达地区，他们的到来、定居，不仅为文山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新的农作物品种。他们与文山地区各民族一起，共同对文山地区的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前，文山地区人口稀少，多数地方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其人滨河流而居，沿河垦为农田，山岭间无水之地，尽弃之不顾”^{[9]46}，“土司所辖夷民，山地多不自殖，任其荒芜”^{[10]13}，加之境内苗、瑶等少数民族“刀耕

火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改土归流后，内地汉族移民相率而来，他们不但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而且在“蛮荒”之乡劈山开地，不辞劳苦，辛勤耕耘。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垦种面积的扩大，耕地逐渐从坝子、河谷延伸到高寒山区。民国《广南县志》载：“汉人垦山为地，初只选择肥沃之区，日久人口繁滋，由沃以及于瘠，入山越深，开辟越广，山间略为平坦之地，可以引山水以灌田者，则垦之为田，随山屈曲，垅峻如梯，田小如瓦。”^{[9]46}在保有土司权力的辖区内，“夷民”将不愿垦殖的荒芜山地，租与来自川、楚、黔、赣汉族移民，汉族移民则“每年纳银数钱以为地税，是谓地皮”。^{[10]13}在农耕生产中，汉族移民普遍使用铁制犁、锄、斧、镰等生产工具和牛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还善于堵坝挖沟，引水灌溉，造福地方。《新纂云南通志》载：“开化府龙潭寨支河、开化里上下河，沿河三十余里，向用水车汲水灌田。然车多坝密，以致沙泥淤塞，河溢为患。咸丰四年（1854年），知府李荣灿勘明河势，由上游龙潭寨开二支河，顺河两岸分溉田亩，尽去车坝，使沙不阻，滞水得流畅。”^{[11]24}在当地民众中影响较大。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玉米及其栽培技术传播到了文山地区。据道光《威远厅志》载：“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包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7]49}这里所说的“包谷”即玉米，原产于美洲，明未经菲律宾传入我国沿海地区，因为它具有耐瘠、耐寒、耐旱、产量高等特点，颇适合于山坡旱地种植，因此在清代前期逐渐普及于内地各省，又由内地经汉族移民传入云南。至迟在道光年间，汉族移民已经把玉米及其栽培技术传播到边远的文山地区，并在各民族居住地区普遍种植，成为文山地区山区居民的主要粮食。方国瑜先生说：“自十七世纪初年以后，广泛种植玉蜀黍、马铃薯在旱地之高产农作物，为发展山区农业经济之利器，起着积极意义。”^{[5]1222}玉蜀黍、马铃薯“这两种作物适宜在山区种植，产量高，是开发山区的利器，对山区农业经济起了巨大的影响。”^{[5]1223}因此，玉米这种高产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推广，其意义非同凡响，它既解决了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问题，又使广大山区不断得到广泛和纵深的开发。

汉族移民移居文山地区较晚，移入初期只能耕种山地，但他们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逐渐致富，并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民国《广南县志》载：“广南农民，汉农勤而夷农惰，夷农居地沃，而汉农居地瘠。汉农勤，虽瘠而富；夷农惰，虽沃而贫。汉农一岁勤劳，种稻之外，兼种豆、麦、包谷，夷农则每岁只种稻一次。有劝以种豆、麦者，掩耳不欲闻。”^{[9]9}

汉农种植各种杂粮，而“夷农”“虽有地而不种，宁任其荒芜”，种植作物唯稻谷，“衣于是，食于是，物物仰给于是”，十分单一，以致贫穷，不得不变卖土地，“近年夷农之田，渐为汉农所吞并，田地爬山，于斯信矣（夷农居地，多在河边坝子，土地肥沃，汉农居于山间干燥之地，土枯水竭，因汉农勤劳，年有余蓄。游惰夷农，将水田典卖与汉农，主者易地，俗谓之田地爬山）。”^{[9]12-13}部分富裕汉农渐由山区移居坝子，耕种肥沃田地。这些记载虽有一定偏见，但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汉民族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文山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其表现是耕地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据民国《广南县志》记载，“广南原属夷地，从未编丁”，^{[10]3}但至清末民初，广南县“农民约四万户，耕地约一百零一万余亩，平均每户约二十五亩”；^{[9]53}民国十二年（1923），广南人口达 285 632 人。^{[12]30}马关县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时，人民 15 571 户，共计大小人丁 72 694 丁；道光六年（1826 年），新增 1 400 户，大小人 6 139 丁；“自光绪纪元（1875 年）以迄于今，五十余年，休养生息，户口繁滋，较之嘉、道年间加增一倍以上”，民户达 26 431 户，118 640 丁口。^{[2]110}可见，清代中期以后，由于汉民族的大量涌入，文山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开发。

三、汉族移民对传播中原文化的贡献

汉族移民多来自内地先进发达地区，特别是移民中的官吏及其幕僚、文人、军士、商人以及家属，基本素质都比较高，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优势，影响着居住地区及其周围的各少数民族，推动着当地文化的不断发展。据统计，改土归流后，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至辛亥革命期间，广南府到任流官知府 93 任 88 人，都是朝廷派来的内地汉族官吏，知府茹仪凤、单光国、何愚、李熙龄等流官，倡文教，兴义学，重农稼，修水利。^{[1]335}这些举措，惠及当地各族人民。随着汉民族的大量迁入、定居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先进的儒家文化也日益影响着当地的各少数民族。民国《马关县志》载：“汉族渐盛，大改旧观，中州礼乐，以次输入。至于今日，纲常道德，文章风雅，亦已大备。故士敦廉洁，女重贞操，力农务本，知耻好义，俭朴成风，忠孝为贵。”^{[2]193}在汉民族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汉语、汉字成为各族人民交流中共同使用的工具，汉族的风俗习惯对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导向性影响。民国《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载，依人“近年受汉人之影响至钜，各种不良风俗习惯竭力改革”。^{[8]4}民国《广南地志资料》记载：“近来风气渐开，诸夷苗多有改从汉人习尚者”；^{[12]31}依人“人口占全

属百分之三十，语言特别，亦多通汉语……丧葬亦与汉人略同，迩来渐知礼仪，青年亦多入学。……近城乡村一切习俗多有改从汉人者”；^{[12]32}土僚“语言习尚亦略近依人，能习汉语”；摆夷“有语言，无文字，亦知汉书，男女杂处，唯务耕种，婚丧礼与汉人相近”；等等。^{[12]33}汉民族文化的传播，丰富、繁荣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促进了各民族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他们学习、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以加快自身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族移民多居住在交通沿线，便于信息传递，其所居住村落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各级衙门机构的治所所在。到民国年间，“做官或经商而来的汉族，大都居于城镇和交通方便的地区，特别是广南县城，从清朝中期到民国年间，汉族人口逐步跃居首位”^[13]。“内地汉族不断涌入广南，传入先进的文化、技术和铁农具工具，汉族与当地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广南，促进了农业、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的发展。”^{[3]3}汉民族长期聚居的地区，促成了近代文山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文山地区因地处偏僻而普遍落后的状况。

总之，近代文山地区由于汉族移民的大批迁入和开发，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如李燕老师在《试论清代文山地区与越南的贸易》一文中所指出的：“得益于大规模移民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广南、开化地区经济，从一开始就得以采用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因此，尽管开发较晚，其经济发展水平在清代中叶就已赶上甚至超过了同属中越边境的红河地区。”^[14]汉族移民对文山地区的开发，为文山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2] [民国] 张自明修，王富臣等纂：《马关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7 年影印出版。

[3] 云南省广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南县志》，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4] 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民族研究》2003 年第 2 期。

[5]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6] [清] 李熙龄著，杨磊等点校：《广南府志点校》，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7] [清] 道光《威远厅志》卷三。

[8] [民国] 陈钟书等修，邓昌麒纂：《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中卷。

[9] [民国] 《广南县志》第6册，1965年云南大学借云南省图书馆藏广南县志稿本传钞。

[10] [民国] 《广南县志》第8册，1965年云南大学借云南省图书馆藏广南县志稿本传钞。

[11] [民国] 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卷141《农业考四》，1949年铅印本。

[12] [民国] 《广南地志资料》上册。

[13] 元文跃：《广南汉族探源》，《文山史志》1997年第2期。

[14] 李燕：《试论清代文山地区与越南的贸易》，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七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原文发表于《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清代改土归流对文山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刘从楷 何廷明

摘 要：文山地区的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腐朽不堪，清康熙六年（1667 年）开始在文山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领主制，加强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统治，改变了文山地区封闭落后的状态，对文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清代；文山地区；改土归流；社会发展；影响

一、文山地区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

壮族是云南文山地区最早的先民之一。壮族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濮、僚部族，这些部族到秦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地方国家，如句町、进桑。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王朝的统一，开始武力征讨西南夷，降服了句町、漏卧等地，并开始在这些地区设置郡县。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刘彻开发西南边疆，令驰义侯率兵征讨西南夷后置牂牁、越嶲等郡。牂牁郡辖十七县，其中十一县在今云南东南部，今文山、砚山、马关县属进桑县地，西畴、麻栗坡属都梦县地，丘北属潭封县地，广南、富宁属句町县地。之后西汉政府又采用“羁縻政策”对西南夷地区进行政治管理。所谓“羁縻”，即封当地各族土酋以官爵，或封侯，或封王，承认他们在本民族中的统治地位，并按旧存的方式去统治本地区的人民，但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服从郡、县官吏。“羁縻”制度自汉唐发展至元朝，开始转变成为“土司制度”，虽然两者在统治方式上都是“因俗而治，以夷制夷”，但土司制度是羁縻制度的扩大化。首先，羁縻制度所册封的地方土著王在政治上承认中央王朝的权威，但他们在所统治的地区拥有高度自治权；土司设置的前提是土司及其领地必须从属中央王朝版图，中央的统治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

^{*} 基金项目：文山学院重点学科“中国历史”阶段性成果。

大为加强。如明朝开始在土司聚集区设置流官加强地方管理,实施土流并治,后来还设置卫所制度,加大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同时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次,在税收方面,羁縻时期,中央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即通过原土著酋长自行收取赋税,再通过朝贡的方式提交郡、县官吏或上交中央。土司时期,中央直接控制管理地方赋税,其赋税由中央制定,再由土司收取后上交地方府衙。

文山地区的土司制度产生于宋朝,是从镇压侬智高起义时开始设置的,继承和发展了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但到明朝时,各地土司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常常兵戎相见,严重影响文山地区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改土归流势在必行。

明代是土司制度发展的较好时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元朝所封土司,采取“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1]7948}的方法授予土司官职。土司是封建王朝封赐的独霸一方的统治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其弊端日益显现,地方土司与中央王朝的矛盾不断激化,不少地方土司拥有自己的军队、财权和司法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并与中央分庭抗礼。为了削弱土司权力,明朝统治者便在云南壮族聚居区设置流官进行管理,实施“土流并设”的制度。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广南西路宣抚司改为广南府,辖今广南、富宁两县。临安路改为临安府,辖教化长官司(今云南文山、砚山)、八寨长官司(今云南马关、麻栗坡)。丘北县属广西府维摩州。但由于当时土官数量多、力量强大,改流时机尚未成熟。加上改流过程中的某些决策失误,不但没有削弱土司政权,反而在改流过程中引起地方政局混乱。明朝政府开始在广南府设置流官时,派遣的是外地流官,因为害怕僚区瘴气(实则力量薄弱,影响力、控制力无法与当地土官抗衡),多不到实地上任,只到临安(今建水)等地遥控指挥。“明万历末年(1615年),受命出任广南知府的廖铉,就因为惧怕疟疾而长期避瘴临安,竟将体现权力的广南府印,交给当时的广南第九世土司、土同知依仕英之子依天寿管理使用。”^[2]依氏土司死后,府印几经辗转流入族亲岑接之手,因而引起内部夺印纷争,导致朝廷出兵镇压,夺印之争才得以平息。

临安府所辖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司到了清朝才开始改流。清朝时期,改土归流时机日渐成熟。首先,中央王朝自明朝开始,经过几百年与土司的斗争,已将土司权力大大削弱。其次,土司腐朽残暴,鱼肉百姓,也不为地方群众所拥护,人民群众纷纷参与反土司统治的斗争,为中央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提供了有利之机。“清康熙四年(1665年),滇南地区爆发大规模反清起义,王弄、八寨、教化等长官司因不堪清朝政府压迫,联合维摩、牛羊等土舍进攻滇南各县,反叛